

存的地名、地貌研究中还是能够找出一个较为正确的答案的。

地理方位 旧志关于晋阳羊肠仓的方位记载择要录下：

《水经注·汾水》记载：《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阳县北山，西南流者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靳彊为侯国，后立屯农积粟在斯，谓之羊肠仓。山有羊肠坂，在晋阳西北，石磴萦行，若羊肠焉，故仓坂取名矣。汉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后汉书·邓禹传附邓训传》记云：“永平中，理滹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国策》高诱注：羊肠，赵险塞名也，山形屈曲，状如羊肠。在今太原晋阳之西北也。

《淮南子》高诱注：今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通西河上郡，关曰羊肠坂。

《元和志》：羊肠山在交城东南五十三里。

《资治通鉴》：初，显宗〔注 30〕之世，治滹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太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死者不可胜算。

胡三省注：杜佑云：宜芳县在古秀容城汉羊肠仓。

《元一统志》《通典》：交城县有羊肠山。

古代置仓，漕运者多。古代山西交通不便，羊肠仓储粮水路运输只限于汾河一线。如能同滹沱连通，达到如郦道元所述：“资承滹沱之水，转山东之漕，自都虑至羊肠仓，将凭汾水以漕太原，用实秦晋。”其功用则大大增强。但由于工程太大，工具落后，加之统治者一味残酷压迫，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故而从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动工到建初二年（77）被迫停工，历时十数年未见成效。

汉代所理滹沱、石臼河历来说法不一，司马彪《后汉郡国

志》所云石臼河似在今河北行唐县；杨守敬《水经注疏》中所言又似为今忻县南云中河；《山西水利史料》刊郑连弟文又云为阳曲东杨兴河与忻县牧马河一段。以余所见当在以下三地考虑。

其一：在静乐县东部东碾河支流石河至忻县西部滹沱河支流牧马河一段。石河是否为汉代石臼河，今尚无证据表明，但静乐石河流入东碾河，东碾河流入汾河；忻县牧马河流入滹沱河。如将三河沟通，则滹沱西行入汾而至狮子河达羊肠仓，合于理滹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之说。

其二：在忻县西部牧马河支流马川沟河至阳曲县北泥屯河、凌井河一段。忻县马川沟河南与阳曲泥屯河二源相距5公里，忻县宋家庄河南与阳曲凌井河相距仅2公里，二河均在古羊肠仓东部，亦合理滹沱至羊肠仓之说。今泥屯河沿河一带有村庄曰中兵、代庄、泥屯、归朝、北路、南路、思西等村；泥屯河与马川沟之间，有王都、王贤沟，村北有平安山。这些地名恐与修河紧密相关。

其三：在阳曲县东汾河支流杨兴河与滹沱河支流温川河段。二水源头以阳兴村为中心，东西仅距4公里，地势亦较为平缓。如将二水连通，则可由汾河溯杨兴河、盂县乌河入滹沱河而通河北。温泉河上今尚有石槽村，石槽、石臼音意近似，是否今石槽即古石臼，值得研究；石槽村西有都都村，亦与汉都虑有近似之处，是否因邓训上书肃宗，以罢此苦役，而易都虑为都都，亦值得探讨；温川河下游盂县乌河入滹沱河口有村名夫城口，此明确说明此地曾住过民夫，并由此而建城，此民夫余疑为即汉代修河之役夫；温川河中部有村名籍营，亦似与修河相关。

总上三说，前两地距羊肠仓最近。《水经注》所云汾阳北山系指建于古交河北之汉汾阳而言，故云晋阳西北，盖北朝时汾阳县迁，此地已属晋阳，否则言“汾阳北山”即可，何能再云“晋阳西北”？如此罗嗦文章，大概不会出自郦氏之手。此为一；其二，管涔山方圆数十里草莽林疏，石多土少，气候寒冷，不具备屯田

积粟之条件；其三，羊肠仓如在管涔山，就不会由汾河漕运，而从治水（桑干河）或滹沱河上游直接就可达河北地区，不会劳民伤财开山引水。至于秀容城之说既非晋阳西北，又非汾阳北山，难以成立；交城东南 53 里之说亦误，按其时交城县治南迁山下已一百余年，东南 53 里乃晋中平川，何来羊肠绝险！故其地当在古交西北炉峪口北山五子寨一带。

地名地貌 古交区的自然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大河川两岸更是优越。这一带有大片四纪黄土丘陵，经几千年洪水切割，汉时平台布满了大小冲沟。居住在冲沟附近的村落名称不少带有“港”，《说文解字》云：港、水道也，今俗称不固定水渠犹为港道。汾河北之长港、大港、刷刷港、港立、千亮港等都因水道得名。不过，大面积较平的坡田仍可见到：如长港一带的平头寺梁就达数华里长。河北北部地区大都为荒原，主要植物为蒿属草本植物，具有良好的农、垦、畜牧条件，在此屯田立仓是颇为理想的。当地老人言，五子寨即为古羊肠仓。周围村名有羊家山、盘道寺与羊肠仓相关的地名。镇城底、炉峪口一带为屯田之处，亦是斯仓运粮必经之路；镇城底西北有粟营沟，炉峪口村北有卸粟岭，不枚举。沿用至今，人多不解，失其原意。羊肠山隋初更名为深谷岭，《元一统志》记云：“炀帝大业四年幸汾阳，途经此地，改名为深谷岭。”隋代在管涔山顶环天池泊营造汾阳宫殿，而由狮子河北经下马城到静乐沿河北上，无疑是一条捷径。羊肠仓在其中途，故更名焉。志载炀帝北巡取道天门关，而由天门关〔注 31〕向汾河靠拢羊肠山也在其中。

始置年代 羊肠仓始置年代在东汉早期，这和西汉时期开垦荒滩、提高农田耕作技术、粮食产量上升是分不开的。《汉书·食货志》云：昭帝时，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资治通鉴》在宣帝五凤四年（前 54）亦记有同样内容。可知其时太原产粮之多。除本地食用外，还远运长安，没有较大的农

业规模和储存五谷的粮仓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屯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一环，其目的在于“广积粮”。西汉在晋阳屯田找不到明确记载，但东汉初垦田确有明文，《郡国志》云：“汉建武七年（31）杜茂奉诏引兵北上，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后汉书·苏竟传》在此段话后续云：“建武十二年（36），光武帝加派段忠，配给杜镇守北边，以守为主，发戍卒、筑亭候、修烽火。”到永平年间，羊肠山始立羊肠仓。由此而知，最迟在公元58年至75年间，是山已立仓。《交城县志》所记“后魏于此立羊肠寨，新通志谓羊肠仓”系北魏重新起用斯仓说。古以粮草为重，故屯兵卫之，以防不测。汉代屯田遗址虽未发现，但杜茂屯田时所筑之烽燧遗名遗迹犹存；天池川天池店东山烽垒残迹孑立，而炉峪口村南山峁已空余“烽峁上”、“火烽上”等地名了。

（六）马栏城

1984年8月10日上午，我迎着初秋的风沿屯兰川西行了30余华里，到达古晋阳名邑——牧城马栏。依据民国年间绘制的一幅交城地图和调查结果，在古交区所知的230多个村、沟、峁地名中，仅得名于牧放的就达50余处，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容置疑，“屯兰”“马栏”二名俱因汉置“桐马官”而得名。

交城产马历史可谓长矣。早在新生代第三纪上新统时，就有大群三趾马活动在丛林中。解放以来，斯马化石与稍后之马牙化石在汾河沿岸屡有发现。先人考证：《左传》所载多产良马的屈地即在今与古交相邻的娄烦、静乐一带，汉魏北齐牧业尤盛。真是源远而流长。

西汉初，汉帝即于晋阳置家马官。《汉书·地理志》云：“晋阳有家马官”是也。其时，古交区属晋阳西陲。旧志又云：“文帝置牧于交城县”，此当为置牧于交城，县乃后人所加，盖因不知汉代交城非县之故。武帝刘彻太初元年（前104）更家马官为桐马官，所牧之马除战用外，还取母马之乳做马酒以供食用。《说文》云：

“桐、椎引也，旧有桐马官，做马酒。”如淳曰：“以韦革为夹兜，受数斗盛马乳，桐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马官。”考汉代家马厩，一厩育马万匹，卫青征伐匈奴，专程买马于太原，想见交地牧苑之大。那时候，凡马栏所牧之马，须打以火记。为本文帝筑专城于晋阳西南名之为印驹城。城东北距清源县治 20 余华里，即今交城县段村是。故城当在段村东。汉时，段村一带为莽莽草野，汾水由南而过，古地形比现在低约 90 米左右。七十年代，在此深度曾取出片状泥炭，据梅斯陶勒〔注 32〕关于泥炭形成年龄的研究数据，泥炭形成至少为 2—3 千年。由此测算，泥炭层正值西周到汉代的地面。汉代到现在，淤积层约合 90 米。马匹在印驹城打火印后，分 2 路进入古交区放牧：一路由印驹城经丰峪沟、石千峰、马矢山（古当名马屎山）或马连岩到大河川牧于屯兰；一路由印驹城经清徐马峪、古交草庄头、走马岭、独兰经镇城村牧于天池川。全境之马及牧放人员均属马官统辖。马衙分置于马栏城、交城，故而马栏城始筑在汉。其城故址在今马兰村西一华里大城沟与小城沟之间的平阜上，二沟之名得于此；屯兰河北一带今尚有活栏沟等地名，马栏村中遗有歇马店等街名；还有为保护马匹与放牧人员在屯兰川与天池川之间设立的关卡板棚村，今名板市村；屯兰川西有关头村，为古关地，马兰村西即为兵营，今有营立村；城西武家庄亦系兵营，今城北沟犹呼为水营沟，似专为防护马栏城不被屯兰河淹没或供城中用水而设。其后有崖窑沟，沟内悬崖凿有 3 层洞窟，每层均有狭道相通，数十洞悬于崖壁非常壮观。1972 年基建时，还在马兰村北和尚坟地挖出汉代素面灰陶罐，内装有五铢钱数枚。这都是汉魏马城文化之遗存。

（七）汉晋阳县界

西汉初年，古交汾河北岸属汾阳县境；马鞍山以南，屯兰川关头以西属大陵县；余地属晋阳县。

晋阳自古为重镇，北界屡受少数部族入侵，故而在界处设关

屯兵。史载狮子河与静乐界处在西河上郡古关，此为汉时关；天门关在隋代即有记载，炀帝北巡经此嫌其关窄路狭，又开东北石崖扩道。此关亦系南北朝前旧关；段村是晋阳印驹城，故晋阳西南境在此以西；汉大陵县在马鞍山取矿冶铁、设置铁官〔注 33〕，故马鞍山为晋阳西境。诚然，因资料局限此论不够绝对正确，但从历史境况分析划分大致似乎如此。

二、南北朝时期

汉末，三国鼎立，群雄割据，交城地区属魏隶于并州刺史部太原郡晋阳县及大陵县。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置并州，改太原郡为太原国。晋因之。东晋十六国时期，本境先后属匈奴汉、前赵、后赵、冉魏、前燕、前秦、西燕、后燕之太原郡晋阳县西陲平陵县北境。公元 396 年 9 月，地始属北魏，仍隶晋阳县与平陵县。太常二年（417）于古交境内置长安县，真君中省（445），景明初（500）又复置。公元 534 年 10 月北魏分裂，地属东魏，还隶晋阳、受阳。公元 554 年 5 月，又属北齐并州太原郡，仍为晋阳西陲受阳北境。武平六年（575）又在晋阳西境置龙山县，公元 576 年 12 月北周陷城，龙山归之；隋开皇十年（590）废。南北朝时期，除大陵（受阳）县外，在古交区前后建县近百年。

南北朝时期，官办牧业经久不衰。事实上马栏川就是牧马中心，牛栏川为牧牛中心，古交及马鞍山一带已成为划川野牧、分群管理这样一个畜牧区。其时，长安、龙山二县县治何处？因何得名？交城境内有哪些北朝文化要地？兹分述如下：

（一）长安县

县治县境 北魏皇始元年（396），十六国混战硝烟未散，南北朝对峙局面已经形成。是年 8 月，魏道武帝大举击燕，9 月攻占并州。未几，山西全境已成北魏王朝翼下之卵。由于拓拔氏一味

争城夺地，大面积山区无暇顾及，居住在吕梁山一带的汾州山胡乘乱将活动区域扩展到大陵县属西社一带及古交境内马鞍山、龙须山地区，战乱波及晋阳西北。为对付山胡的骚扰，稳定晋阳政治局面，太常二年（417）北魏政府析晋阳分置了长安县，取其长治久安之意。县初置之时，南境邻晋阳县，北境临娄烦，西境接受阳县，东境毗盂县。长安县境相当于今古交地区及娄烦之南境，县治当设在古交镇西南原平川之常安村。起到了西镇山胡、南屏晋阳、北护马苑的军事作用。考其地形，原平河北山势较陡，村后有山名寨圪塔，系护城兵屯扎之地；河南山坡缓平，面积颇阔，城邑当筑于此。河南西侧有沟名神堂，为古庙宇之遗迹；沟东口山坪坡田有上至新石器龙山时期，下至南北朝时期的的文化遗存。计有粗绳纹拍制鬲足、篮纹鼓腹罐残片与秦汉时期的楞形印模拍制细绳纹瓦，散布于神堂沟东侧地面和土堰切面。目前，虽没有发现古城遗址，但就其文物散落面积推知，南北朝前此地即为古人类聚居活动之重地。

村名方言 常安村名写作常安，读曰“张干”^(注34)。考古交方言乃山西语系之一枝，在这个语言体系中，“长”是读为张音的，“长不长”读曰“张不张”，“长短不齐”读音为“张短不齐”，而“常”的读音亦读常，于今无异；除“常”安中的常读音为“张”外，绝无二例。毫无疑问，“常安”在古代是写作“长安”的。“安”字读音为“干”，亦仅有此地此村读“常安”为“张干”。究其原因当有三：一即避讳帝王名姓庙号谥号；二为同陕西省古都长安区别；还有一种可能即因历史上此县时置时废，故而音转书误。熊树梅先生在《谈中国地名的起源和演变》一文中谈到：“唐肃宗经安史之乱，十分痛恨安禄山，下令凡郡县名有安字者都要改，如安定郡改保定，安化改顺化，安邑改虞邑，福禄郡改唐林郡等达35处。”由此而知，长安呼曰“张干”恐系于此时，寓安禄山之族已杀干之意于其中。明代，光宗朱常洛为避讳，曾将地

名中的常改为尝，但此“尝”方言读为“伤”非“张”，故与此恐无关系。

史籍 《交城县志》虽无北魏长安县之记载，但职官章已有北魏县令之说。言“杨遇仙辽西人，本姓杨，避仇改李事魏为交城人。累官征戍将军，李密其孙也”。由于史籍记载交城县始置于隋开皇十六年（596），所以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云其时未有交城县，何来县令之谈。然细析上说，并未提交城县，只言为交城人。因其时地有交城，杨氏由辽西迁来居此，为今镇城底人是也。其人才学出众，故北魏置县时择为长安县令，此是顺情合理之事。《交城县志》始纂于明初，此文记述如此之详，而北魏人物列传无其名，故资料当来源于碑铭，断非臆说。按《交城县志》所记，不言县名只言县令姓名及年号，亦未脱离古代碑刻之体例。唯惜所记不全，为古今憾事。

（二）龙山县

龙山得名 龙山因何得名呢？旧志记龙山：“因县西龙山名。”《元和郡县志》云：“悬瓮山一名龙山。”成书于北齐的《魏书·地形志》云“晋阳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按此说，龙山之名得于悬瓮山。然龙山之名始见于汉代，战国前其山不称龙山而称悬雍山，亦曰结拙山，具见于《山海经》。以余拙思，汉时所指龙山泛称太原西山。直到北宋时期，屯栏川一带尚置乡曰龙山〔注35〕，地离悬雍山已有百里之遥，管之未免太远。因何西汉谓太原西山为龙山呢？

首先，以牧马名山。中国以马喻龙，由来已久，仅择唐前称谓录之于下：

《周礼·夏官虞人》：“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下为駢，六尺以上为马。”

《吕氏春秋·本味篇》：“马之美者，青龙之匹。”

《汉书·百官公卿表》有“龙马监长丞掌管宫庭马匹”。

《魏书·谷吐浑传》赞马驹为“龙种”。

南齐谢朓《谢宣城集·送远曲》：“方衡控龙马，平路聘朱轮。”

南陈《徐孝穆集·骢马驱诗》：“白马号龙驹”。

唐《艺文类聚》：“龙马御甲，赤文绿色”。

唐杜甫《送刘仆射判官》诗：“岂因格斗得龙驹”。

观之，从周到唐，从南到北，喻马为龙者多见，而且只有好马才配称“龙”；更有甚者，还加龙字于马旁写作駿，如王引之《经意述闻》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駿，北方尽乌駿，南方尽骍马。”汉魏北朝时期，古交区一带为王室牧苑，更兼水草充足，盛产良马，故而呼之为龙山。今古交境内屯栏川有龙须山、南龙沟，原平川有龙庄沟，大河川卢峪口有王龙沟，雁门北有龙尾头，大川有龙子村等等大都与牧马相关。故而推知，汉魏之龙山非专指晋阳悬雍山乃泛称养马之山。

其二，以山势而名。因山脉蜿蜒曲折而似龙以名山者，古代有但不多见，刘禹锡《虎丘寺路宴》有“埋剑人空传，凿山龙已去”之说，只是借喻。不过，从古交屯兰川西龙须山沿山脊西折东返灵钟山、孔河岭，由石家庄北向至黄家岭到龙尾头村西这一带山势看，曲折多姿跃跃欲动。海拔最高者龙须山为2118米，最低处亦在1500米以上。时起时伏，摇头摆尾，俨然一条苍龙。因而以山势名山为龙山者其可能性亦难排斥。

其三，以河川而名。古代由水及鱼，由鱼及龙，故地有鱼龙等村。但综观历代方舆，以山名水者多，以水名山者少。至于以河道弯曲如龙而名县者亦偶尔为之，不过，古交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如网也是不容忽视的。

县治县境 关于龙山，史籍记述如下：

《隋书·地理志》：“晋阳，后齐置，曰龙山，带太原郡。开皇初郡废，十年改县曰晋阳，十六年又置清源县，大业初省焉。”

《元和郡县志》：“高齐武成帝河清四年，移晋阳县于汾水东，

今太原县理是也。武平六年于今晋阳县理置龙山县，属太原郡，因县西龙山为名也……（开皇）十年，废龙山县，移晋阳县理之。”

《读史方舆纪要》：“龙山城在县西北（指太原县，县治在晋源），北齐分晋阳县置龙山县于此，因山为名。或曰齐移晋阳县于汾水东，而于城中置龙山县也。隋开皇十年，改龙山曰晋阳，移入郭下，改旧晋阳县为太原县。”

《北周地理志》：“龙山，北齐置，有旧置长安县，有晋祠、蒙山、风谷山，有梗阳驿。”

考北齐龙山县境，当囊括晋阳城西北边山及古交全境，比北魏长安县略大。旧长安在原平川，晋祠、梗阳驿〔注 36〕均在边山，蒙山、风峪山〔注 37〕在晋阳西北 8 至 10 数里，可见其境大部为山；《隋志》明确声称：晋阳县有晋阳宫、晋水，北周地志除晋阳宫外，还将大明宫及七殿九门三院两池〔注 38〕等城中建筑及晋阳东门都系于晋阳县，绝无一山一岭之记载，故晋阳县辖境均在平川。龙山县所辖之晋祠、梗阳驿地形比现在要高得多，都是处在半山区的。晋祠所据之地今犹呼曰晋王岭，其高可见。古梗阳驿位于山口洪积扇地带，其东南比现在要低得多。七十年代初，近城之东观湖底还发现有琉璃建筑〔注 39〕。经千余年汾水与诸洪逐年淤积，才形成了现在的地貌。

晋阳县治东迁的原因之一是由战争造成的；河清二年（563）三年（564），周军与突厥数十万大军连年由漠北进犯、兵临城下，故于河清四年（565）移晋阳县理于汾水东，凭藉汾水设险而防；十年之后的武平六年（575）才析晋阳置龙山，以辖山区。晋阳县西境跨汾水管至晋阳故城，故城为太原郡治，故而北齐隆化元年（579），周武帝直取晋阳，意在夺其首府也。

《元和志》所记，疑窦百出。可以说，在古代除侨置县外，绝无将县治设在邻县管辖范围之例。《隋书》成书比《元和志》早约 177 年，其记载亦含有境内分置之意：“十六年又置清源县”之清

源就是置在今清徐县治。隋开皇十年（590），废龙山与晋阳又合，故云：“十年改县曰晋阳。”至于龙山“带太原郡”之说，《隋书》在太原县下亦曰带郡，推知晋阳故城当时为郡治，东带太原县、西带龙山县，郡在二县之中也。按《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原为军事著作，地形方位距离都是经过一番认真订证的；是书明确记云：城在晋阳西北，此说是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的。《元和郡县志》关于龙山置在晋阳故地之说或为按唐时置晋阳、太原之情形而录记，因无确切之根据不敢断言。按古代置县之规矩，为便于行政管理、统治人民，多数县治都是择其适中之地而设（不排斥偏治之例）。如将龙山县设立晋阳城中，舍弃西北高山大川，偏于一隅，实际上所起作用与不设置相差无几。

毋容置疑，古交全区其时属龙山县之域地。按晋阳之西北、县境之中，县治应设在古交区屯兰、原平二川一带。在屯兰，北齐名城首推马栏。公元550年5月，高洋称皇，改东魏国号曰齐，即于马栏古城置牧，统管晋阳全境牧业，前文已述。此城即今马栏村是。刘汉时为牧城。北朝时，以大川专置牛栏，以屯兰专置马栏，故始有马栏之称，盖马栏为俗名耳。

城位于古交区屯兰川中，南依山、北濒水，置于汉代牧城旧址。今马栏村原是古城关外之邑。古城东有狐神祠，东南有水神庙，东北有奶奶庙、石佛堂，南有兴济寺；此中除狐神祠、奶奶庙始建无考外，余都为北朝时或前之古建。狐神祠供奉春秋晋大夫邑人狐突，交邑古俗为官员祭祀方便，县治之处的狐神祠都设在城郭附近；称水神庙而不称河神庙，知其之早。下限很可能在唐代之前，亦或更为久远；据村民言传，石佛堂北崖有石雕佛像，今遗址后山峁犹云佛头沟、佛颅岭，所凿之石佛高大可知。而崖雕佛这种形式在南北朝时是登峰造极的，中国所有著名的石窟大佛几乎全部为其时所创。马栏古庙中，始建年代最明确者为兴济寺。寺高踞于古城东寺岭上，俯瞰马栏。寺内有遗碑三幢，据

天圣四年（1026）碑记，寺始建于北齐天统五年三月八日（569），早龙山建县4年。寺北厢有一古碑，碑首纠盘双龙，中琢雕北朝通行之尖拱式壁龛，龛内佛像一尊，扶膝而坐，面貌衣纹均属北朝风格，佛龛式样与太原市天龙山石窟无异。如此众多之古建，若非名城要地，官家修筑，是很难建成的，也是很不值得这样大兴土木的。其时人烟众多，市井繁华之景想见。就在这幢碑中，隐约可见“伯安僖骠骑大将军”、“马兰”、“交城”、“苑”等字词。碑首刻名“乌丸洪敬”。经查，乌丸本作乌桓，原为西域国名，后以为氏。《通鉴·胡注》：乌丸盖为东胡乌桓之种，因以为姓。北魏初，有乌丸王库贤，后周王德、王轨皆赐姓乌丸氏，为乌丸王。此乌丸为东胡族一支，汉初附匈奴，武帝后附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迁乌桓万余落于中原。碑中所云伯安僖为孝文帝之子、献文帝之孙，字为永寿。太和九年（485）封咸阳王，加侍中、骠骑大将军。碑中三次提及此人，并加颂扬，可推知北魏时马栏牧苑曾属骠骑经营、放牧战马，或为孝文迁都之前封僖之地。就在马栏对面崖窑沟，依崖所建三层住兵石窟保存完好，其气势之宏伟三晋绝少，除最下一层被山土坍埋外，可见者尚有三层30余洞窟，此亦为其时所建。

值得推敲的是立在兴济寺遗址南首之天圣碑，碑铭为“交城监竈山乡马栏村兴济寺碑铭”，为天圣四年（1026）重修寺院之记述碑。《集韵》释竈曰：“龙老作竈”，“力钟切”，可断此“竈”即龙山二字无疑，而且是很古老的龙山。既云龙山乡，即意味着县治不会超过这一带。果如《元和郡县志》所云，晋阳龙山是否距此太远！此龙山一乡之地是否太大！故曰龙山县治当在马栏古城旧址。北宋龙山乡与北齐龙山县间隔仅仅370余年，从历史时间推断，古龙山之概念在其时还应记忆犹新。就此问题上说，石碑是很有地方历史研究价值的。依我之管见，北宋只不过将北齐之龙山旧地沿用改称龙山乡罢了。

建废时间 《元和郡县志》记云：龙山县置于武平六年（575），废于隋开皇十年（590）。按此说，置县当为15年，《资治通鉴》别有异说，据载：“隋义宁元年（617）李世民出私钱百万，使龙山令与裴寂博。”注：“盖开皇中赋廉尝为龙山令。”察此，龙山县最后一县令即赋廉。但义宁元年距开皇十年间隔已然28年，即使赋廉其人早年任过县令，恐也被世人淡忘了，何故于此又书？是否此间又分晋阳、交城置龙山，史无记载，推测而已。

（三）牛栏川

下文录自《元一统志》：“孝文山，元魏起於云代。此山乃魏道武牧马之地，故本县有马栏川、牛栏川及地有达奚、乞伏、破六韩三村名。……”

文中孝文山即今交城县治西北二百余华里关帝山之主峰，海拔2785米，仅次于五台山，为华北第二高峰。牛栏川即今古交区之大川，其余三村为北魏鲜卑贵族后裔隐身之地。达奚氏为献帝五弟之后，十姓之一；建西秦者为乞伏氏；破六韩之祖上即三国·魏太武所留之匈奴单于苗裔厨泉貌之叔父去卑弟潘六奚，子孙以潘六奚为氏，后人伪作破六韩，唐时书为破落汗。上述3村今仅余破六韩，地为古交镇城底西南佛罗汉村，当地读音犹为破陆汉。

今古交全区总面积为1540公里，合231万亩。其中，仅草地及宜林宜荒地就达103.1万亩，占到总面积的44.6%。古代面积远比此大。故元魏于此专置牛栏、马栏。其时，交城北山一带属山胡活动范围。如将牛栏、马栏设于北境无疑置羊虎口。大川、屯栏二地南有晋阳、梗阳作盾，北有交城为冲，后又置常安县于其境之中。所以，设牛栏于大川是很有保障的。今大川河老辈尚呼云牛栏河。中部川西尚有名云抵家山，川南有草庄等名，均源于牧牛。牛栏川为官家之牛栏，百姓养殖耕牛相当普遍，除种田外兼运输而后食用，皆赖以为生。如天池川之牛圈沟村、屯栏川关头附近之尖牛坪等都与牛牧有千丝万缕之关系。



古交马栏村兴济寺北齐碑



古交武家庄古堡



马栏村兴济寺遗址

七栏川北魏崖窟



(四) 下马城

城位于古交城北 60 华里，娄烦城东北 60 华里，静乐城东南 50 华里。西汉至清初，先后隶属于汾阳、晋阳、长安、龙山、玄池、交城。清康熙年间始划归静乐，今属娄烦县东北境。城始建于北魏，因其山高气爽，景色宜人，被北魏帝王选中。每逢三伏，太武帝即策马临幸，消暑度夏。孝文帝效法先君，亦数季登临故名曰下马城，实即行宫。《读史方舆纪要》云：“下马城，县北一百六十里（指交城县北），接静乐县界。相传元魏孝文往来避暑下马之处。”可知明末之际，下马城尚属交城。民国初年，其城犹有遗迹，现故址存有唐之寿圣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俗呼云唐碑亭。古道南通晋阳，北接管涔山巅汾阳宫。魏太武、孝文均为鲜卑族人，马背上征战多年，饮马天池以为乐事，遂频繁往来于汾源、晋阳之中。因山路崎岖，行程遥远，故而太武筑城于斯，名曰下马。

总之，北朝长安、龙山二县县治虽无足够资料进一步加以证明，只能依据现有材料去寻觅探索。但是，它的确切位置肯定会随着科学文化的发达和地下文物的发现而得出一个更为可信的结论来。

(五) 并州大寺

南北朝时期，石壁玄中寺曾有一位闻名全国的名僧驻锡，他就是净土宗创始人之一昙鸾祖师。在其移驻石壁寺之前，魏主饬大师住持并州大寺，此大寺便是唐代之汾州大寺——众香寺。盖因其魏属并州、唐属汾州故称。

这座一千多年前的名刹今在何处？综合各方面资料，当是今崖底大寺。

崖底村因建村于佛崖下故名。其地背靠莽莽群山，面对晋中平川；文谷水绕村而过，恬静清幽，确为一方胜地。1959 年建文峪口河水库，村庄搬迁，大寺遗址成为水域，旧风貌已不复见。

大寺建于文河西岸，面对石佛崖。佛崖北为佛崖沟，上有黄

崖村（应为佛崖村，因佛、黄音近故云）。佛崖南为托钵沟、牒沟，传云因僧人托钵朝寺拜佛而名。又南为北峪口村北寺坡梁因其为赴大寺必经之路而名。大寺北有孔家峁，南有峰子峁，因建烽火台而得名。峁下有沟名大瓦，系北宋前翻修大寺烧制砖瓦之所。峁南即为西峪口村北之僧头岭，因其葬寺院高僧而名。

佛寺建造年代当在北魏。据残存之绳纹砖考证，北魏前其地即有古建。1985年5月，余于遗址觅得残碑一块，碑首精雕9个佛龛，佛像体态轻盈，形状各异，其风格同于北朝石刻。佛崖上遗窟高悬，尚残存有佛像10余躯。寺坡北侧，有一座明代僧塔亦已坍塌。大寺遗址基本没于水中。

据耆老回忆：寺院规模很大，虽历代失修，到民国时期，所占面积仍约有2万余平方米。寺院钟鼓二楼高耸，大雄宝殿气势宏伟，7尊大佛为境内之最。殿内梁柱为优质红松，粗的直径达1米余，说明建寺之时尚地处森林。寺内藏有历代碑刻30余幢，石刻、铁铸、木雕、泥塑佛像难以计数。抗战时期，仅各种木刻像就堆放了满满7间殿房。寺内佛均无首及手脚，疑为唐会昌年所毁。大寺塔院亦分为两处：古代塔院建在北峪口村北坟台坡上，明清塔院建于大寺后寺坡梁。

三、隋唐时期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开皇十年（590）废龙山县，复合于晋阳。4年之后，终因地广治偏又于开皇十六年（596）析晋阳西陲、文水北境置交城县。古交地区为交城县之北境。唐天授二年（691），交城县治由古交城移治山南却波驿后，又于先天二年（713）析交城县北境，静乐县、宜芳县二县之南境置灵川县〔注40〕。翌年，因地非要冲复废之合于交城。废后旋于同年12月即开元初年〔注41〕置娄烦监牧于交城北境、娄烦城东。贞